
毛泽东为什么放弃新民主主义

——关于俄国模式的影响问题

杨奎松

1995年春，中央文献研究室出版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一年以后，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龚育之在一次会议上，就毛泽东在七大讲话及报告中突出强调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问题，介绍了自己研究和学习的心得。1997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胡绳又进一步谈到了这个话题。他不仅明确肯定了毛泽东当年的观点，即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并特别强调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走了一段弯路，经过了许多曲折。本来，“新中国成立，按《共同纲领》规定，民族资本主义在五中经济成分中有一定的地位，可以适当地发展。到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我们原来的一些想法和做法发生了变化。此后20多年经过许多曲折，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又走到正确的轨道上来”。这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能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始终按照《共同纲领》的规定，适当地发展资本主义，保持多种经济体制并存的局面，我们会少走许多弯路。

事实上，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恐怕许多人都存在着几乎同样的遗憾。而今公开披露并肯定毛泽东当年关于中国“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的论断，肯定建国初期《共同纲领》所规定的，以多种经济成分并存为特征的新民主主义制度才是当年适合中国国情的正

《胡绳访谈录》，《百年潮》1997年第1期。

确发展轨道,不可避免地会进一步加强人们心中的疑问:为什么毛泽东自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1945年还在强调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几十年不变,仅仅几年之后他就放弃并且否定了这一正确方针呢?

全面考察毛泽东当年为什么先是极力主张新民主主义,接着又迅速放弃新民主主义,不是本文的目的。但是,不论我们怎样认识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的态度变化,有一点是不能不了解的,那就是来自俄国经验和俄国模式的影响。本文拟就此做一历史的考察。

新民主主义问题的缘起

所谓新民主主义,其实关键在一个“新”字。历史上的民主主义,是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的。共产党人在民主主义四个字前面冠以“新”字的目的,就是想要在承认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的前提下,追求一个“非资本主义的发展前途”。因此,新民主主义问题的产生,首先就是同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问题联系在一起。

早在1882年,当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他们的《共产党宣言》写俄文版序言的时候,就曾设想过落后国家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他们曾经认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像俄国这样一个纯粹的农业国是有可能同发达的西方国家一起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不过,作为一种例外的情况,马克思和恩格斯显然不曾讨论过这种过渡的具体形式。

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由俄国革命引发欧洲革命,再由欧洲社会革命的普遍成功将俄国这种周边的落后国家直接带入共产主义社会的情况,后来没有出现。但20年之后,俄国这样一个刚刚步入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不久的落后国家取得革命成功的事实,促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20页。

使列宁和他的共产国际不能不进一步正视这个极为现实的问题：无产阶级能不能在落后国家起作用并把它们引导到共产主义？

列宁的观点很明确：只要有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和本国共产主义先锋队的领导，落后国家完全有可能通过“劳动者苏维埃”这样一种非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作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仍旧寄希望于欧洲发达国家革命的广泛爆发和胜利，他并非认为所谓先进国家的无产阶级，是指俄国，或者仅仅是指俄国，更不幻想落后国家可以一步越过资本主义整个发展阶段。

俄国革命胜利后不久，列宁就特别提出了利用国家资本主义的办法来为俄国经济的发展“补课”的问题。随后，他进一步提出了“间接过渡”的思想，为恢复国民经济下决心实行了允许资本主义适度发展的“新经济政策”，以便弥补俄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所带来的种种历史缺陷。因为他相信：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就没有社会主义。俄国尚且如此，远较俄国为落后的其他东方国家更不必说。在很长一段时间，他甚至怀疑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是否存在着足够的工业无产阶级。当1920年共产国际二大召开之际，针对一些东方落后国家的代表大谈要向俄国十月革命看齐的问题，列宁强调指出，对于大多数东方落后国家来说，那里的革命实际上还没有达到俄国1905年革命的程度。要想在那些主要居民群众都还是农民的东方落后国家推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计划，不仅是空想，而且是完全错误的。因为在这些国家里首先成熟起来的，还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而对于埋葬封建制度来说，民主主义无疑是最有力也是最适当的革命武器。

中国革命应当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革命，第二步才是社会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63页；《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9-24页。

主义革命,这个道理中国共产党在它诞生的第二个年头就已经明白了。但这个时候的中国共产党还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而共产国际又是在俄国共产党直接指导下工作的世界共产党,因此,中国共产党人这时很自然地习惯于依照俄国革命的模式来看问题。既然俄国1917年资产阶级二月革命胜利后,布尔什维克并没有允许俄国发展资本主义就紧接着发动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十月革命,中国为什么不能照此办理呢?何况,列宁已经说明,只要有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和本国共产党的领导,落后国家就有可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那么,在苏联以及主要由欧洲国家共产党组织起来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再加上中国自身的共产党,难道中国还有必要先经历一个俄国1905年革命的失败,让资本主义发展一段,再来一次十月革命吗?

对此,共产国际这时其实说得很明白,即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世界政治形势已经把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国际无产阶级与国际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切被压迫的落后国家与民族根据自己的痛苦经历,只能站在国际无产阶级一边,而成为世界革命的一种助力。共产国际为帮助落后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固然要同那里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暂时合作,但它“最主要和必要的任务则是建立农民和工人的共产主义组织,以便能够领导他们走向革命和创立苏维埃共和国”,从而“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为此,应当努力使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从头走就由共产主义先锋队所领导”,反对资产阶级民主派控制革命运动和把国家引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企图。

在这里,共产国际提出了两个引人注目的观点。第一,它贯彻了列宁的思想,肯定落后国家完全可以在先进国家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和本国共产主义先锋队的领导下,直接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

展道路,不必经历俄国1905年革命后那段资本主义发展的时期;但第二,它确信,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不可能直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它需要经历两次“过渡”,即第一步通过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暂时合作,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先经过一定形式过渡到苏维埃制度,然后再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过渡到共产主义”。

这种多少反映出列宁有关“间接过渡”思想的说明,没有引起共产党人的足够重视。由于对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所处程度的认识,差不多总是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之中。

在1923年6月召开的中共三大上,多数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程度和前途问题看法不一。陈独秀、毛泽东等认为中国离资本主义甚远,除非发展一段资本主义,否则不仅无产阶级太少,就是资产阶级的力量也远不足以进行一场民主革命。张国焘、蔡和森等则相信,不论中国社会发展程度如何,至少无产阶级的力量已经到了可以夺权的程度,因为中国无论哪一支力量的发展速度都不能同工人力量的发展速度相比。结果,三大决议模棱两可地表示:“工人阶级要反对资本主义而无政治上的自由权,必不能实行其经济争斗,发展其经济组织”,因此革命的第一步必不能反对资本主义,而应以军阀制度为敌。但为了革命的最高目的,“中国无产阶级又必不当以‘国民革命’为自限”,并且在第一步革命完成之后,无产阶级务必“协力缩短自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的过程,而达到共同的最高目的——建立无产阶级独裁制,创造世界的苏维埃共和国”。

不论三大决议的措辞如何含混,至少我们从三大选举的结果

毛泽东在三大期间表示:“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因为,资产阶级没有力量,无产阶级也人数太少。或者出现一个和平时期,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无产阶级人数大大增加;或者出现一场世界革命,因为不推翻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国民革命就不可能出现。(李玉贞等编:《马林与第一次国共合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版,第213、231、236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7年版,第139-140页)

可以看出,陈独秀、毛泽东的意见在当时的中共中央多半还是占上风的。因此,当几个月后,共产国际指示肯定中国革命第一步只需要建立一个对外反帝,对内民主,没收一切大资本,并把土地分给农民的革命政府之后,陈独秀等几乎是公开断言,现阶段革命的胜利多半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充其量也只能获得部分政权。陈提出:“国民革命成功后,在普通形势之下,自然是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只是“彼时若有特殊环境,也许有新的变化”;但即使那样,无产阶级在彼时多半也只能获得若干政权。因此,“这种未来的机会我们没有预计的可能,也没有预计的必要,现在只有一心不乱地干国民革命”。换言之,目前的中国革命程度其实不过是俄国的1905年,而非俄国的1917年。

不过,共产党人这时对于中国革命程度问题的估计,很大程度上其实并不是从中国的经济发展程度出发的,它更多地是从现实的力量对比的角度来考虑的。因此,进入到1925年,随着国共党内合作的矛盾日趋尖锐,而中国共产党已迅速从一个只有百十人的小组织变成一个开始对国民革命发生重要影响的群众性组织,不仅中共,就是共产国际中许多人的看法也不能不发生微妙变化。它们很快就相信,中国共产党完全有可能对中国革命起到支柱的和领导的作用。因此,张国焘等人的看法又渐渐开始占了上风。在这一年1月由共产国际代表直接指导下召开的中共四大上,三大入选中央的毛泽东落选,三大时落选的张国焘重新进入中央领导核心。与此同时,四大决议指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绝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为,第一,它固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继续,但尤其是十月革命后广大的世界革命之一部分;第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1923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81-83页。
《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号,1923年12月1日;《中共中央与团中央联席会议记录》(1924年1月1日);中夏:《论劳动运动》,1924年3月22日《民国日报》副刊。

二,它固然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但它在政治上已含有社会革命的种子,要由民族革命引导到无产阶级的世界革命,因此,它必须由最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并取得领导的地位。

既然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又有无产阶级的有力参加和领导,决议明确提出一个问题:“民族革命胜利后,能否接着就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是否必须经过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这个问题提出的本身,就显示出与会者大多数人已倾向于把中国革命在程度上与1917年俄国革命相类比。尽管还没有谁能够说服全体与会者相信,中国用不着再经历一个俄国的1905年,但多数与会者毕竟赞成把这个问题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当时的力量对比联系起来。用决议的话来说,这个问题“必得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中自己阶级的革命准备至何种程度及那时的社会的客观条件定之”。这等于说,中国革命存在直接走上十月革命道路的可能性。当然,决议反映出会议上仍有不同看法。事实上,不少激进一些的共产党人基本上就主张一步跨入社会主义。他们在会下发表的文章中宣称:无产阶级本身就是为了取得政权来参加国民革命的,与其让资产阶级得到政权,成为日后革命的障碍,不如在革命过程中就将其连带推翻,把国民革命直接引导到社会革命的道路上去。

否定中国革命后可能出现一个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尝试,在1926年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当时,蒋介石发动了“三·二一”事变,把共产党人赶出了国民党中央。力量对比极端不利的严峻现实显然使中共领导人对四大决议的说法产生了怀疑。陈独秀很快表示,过去忽视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依据目前资产阶级已经占据了国民革命主导地位的事实,即使国民革命成功,中国革命也到不了俄国的1917年,向资产阶级夺权的问题不可能迅速提上议事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329-338页。

F. M.:《民族革命中的共产党》,《中国青年》第89期,1925年8月22日;中夏:《劳动运动复兴期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国工人》第5期,1925年5月。

日程。他们公开承认：“我们不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决不幻想不经过资本主义，而可以由半封建的社会一跳便到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的资本主义必然要发展起来”。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暂时强大，与中国必然要走一段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在共产国际看来似乎没有必然的联系。至少，共产国际关于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观点已经肯定，即使中国的经济发达程度相当于俄国的 1905 年，也不等于说它必定要经历一个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阶段。因此，在得知中共中央的看法不过几个月后，共产国际就明确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在 1926 年底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决议重申：中国的民主革命未必会导致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革命发生在资本主义没落时期，它是推翻资本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共同斗争的一部分”。中国革命的前途“将不是纯粹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这个国家将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这将是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的过渡时期的反帝革命政府”。

至此，关于中国革命前途问题的讨论和摇摆算是告一段落了。在接到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决议后，中共中央公开承认：“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即是我们自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仿佛多做一点便违反了革命的铁律”。国际的决议则明确“指示我们必须准备整个的中国革命能够一气呵成，而不可在主观上注定了我们必须有第二次革命的命运”。这样

正庸：《我们的功罪》，《中国青年》第 119 期，1926 年 4 月 24 日；《国民党与共产党关系问题》，《中国青年》第 131- 132 期，1926 年 8 月 31 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1926 年 7 月 12 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卷，第 152- 154 页；陈独秀：《我们现在为什么争斗》，《向导》第 172 期，1926 年 9 月 25 日。
《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1926 年 11 月 30 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1926 年 12 月），《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 1 辑，第 263- 286 页。

就指明了无产阶级取得国民革命领导权的极端必要性。不过, 1927年初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毕竟不等于“无产阶级、农民和其他被剥削阶级的民主主义专政”。因此, 中共中央虽然注意到一旦“由无产阶级实际领导的国民革命成功, 自然不必再造成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环境, 而是要造成从资本主义过渡到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之政治环境”, 但它仍然委婉地重申了中国革命可能需要分两步才能走上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看法。它明确讲, 即使革命胜利, 也要先“由现在的国民政府做到工人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制, 集中铁路、航业、矿山、大工业, 于国家机关支配之下”, 然后再“行向社会主义”。

中国革命有没有一个“过渡时期”?

仅仅确定中国革命的前途是非资本主义的, 这还不足以形成新民主主义的理论观点。新民主主义的重要思想内容, 是要承认, 即使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完成了民主革命, 中国仍必须经过一个相当长的过渡时期来发展生产力, 才能走向社会主义。但是, 十分明显, 在大革命失败之后, 共产党人在很长时间内并不这样认识问题。即使是那些曾经一直认为中国革命是在 1905 年的中共领导人, 当他们发现俄国革命的失败经历正在中国重演的时候, 他们很显然更期望这种失败不是俄国的 1905 年, 而只是俄国 1917 年 7 月的那次短暂的挫折。让人不解的是, 斯大林恰恰就在鼓吹这样的看法。

国共分裂刚刚成为现实, 他就非常明白地宣布说, 中国革命只是遭受了暂时的失败, 它从失败到复兴绝不至于像俄国 1905 年革命那样要等 12 年的时间, 其失败的程度不过“类似于布尔什维克

《中央政治局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体会议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1927年初),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 第19-22页。

一九一七年七月所遭受的失败”；只要过几个月——“经过半年，经过一年”——革命就会重新走到大街上来了。为此，他很快就主张共产党人要准备打出苏维埃的旗帜来。这自然使部分中国共产党人“闻之距跃三百”。毛泽东明确讲：“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但从前总以为这是在一九一五年，这是以前极大的错误。”

为了一步成就俄国的十月革命，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下，中共中央模仿俄国十月革命，接连组织发动了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一系列大规模的武装暴动。他们竭尽全力地把所有怀有革命愿望的人都推到大街上去，甚至就连苏联驻中国的外交官员也不顾一切地参加到中共的暴动行动当中来了。为此，他们毫不犹豫地吧俄国式的苏维埃，也照搬到中国来了。

“苏维埃”在俄语中是“会议”的意义。它之成为特有名词，完全是俄国革命本身的产物。它是在俄国1905年革命高潮中出现的工人代表会议的一种简称，最初是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的，但很快就变成具有工人起义机关和工人自治政府性质的一种权力机构。到1917年，这种劳动群众自治政府性质的政治机构再度出现，并且日渐成为与上层立宪会议相抗衡乃至与政府相并立的一种事实上的政府。布尔什维克由于成功地在苏维埃中逐渐取得了优势地位，因而很快把苏维埃变成了反政府的革命起义机关，并在革命胜利后直接把苏维埃当作了苏联权力机构的形式和名称。

显然，苏维埃本身有着作为起义机关和政权机关的两种性质。作为起义机关，它是适合于俄国工人斗争需要自发产生并在一种政府无力制止的环境中发展起来的，它同时也是一种充分民主的并包容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各种革命党派代表在

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1927年7月28日），《列宁斯大林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280-283页。

《湖南致中央函》（毛泽东稿）（1927年8月20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354页。

内的统一战线的组织。毫无疑问,要在工人力量弱小、组织薄弱,而白色恐怖又极为严重的中国,自发地形成甚或人为地制造这样一种具有广泛群众性和代表性的起义机关,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此,绝大多数共产党人这时也很少存在这样的幻想。他们更加重视的其实还是作为政权机关的那种苏维埃。只不过,作为一种特殊权力机构的苏维埃,除了产生代表的独特形式以外,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集权制了。按照俄国模式提出的苏维埃政策目标,自然着力于实行共产党领导的阶级专政。它不仅要剥夺资产阶级等各种剥削阶级和一切反对派在政治上的发言权,而且在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不可避免地要严格设定阶级界限。这样一来,苏维埃革命的性质就难免要发生严重的混淆。

最早相信苏维埃革命担负着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双重任务的,是共产国际在中国的代表罗明那兹。他关于苏维埃革命是“无间断的革命”的观点,是随着苏维埃模式的形成而出现的一种必然的逻辑混乱。当莫斯科开始按照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的方式在中国各大城市中组织武装暴动之后,他就断然宣布说:如果现在仍然把中国革命看作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不够了。“目前,革命如不远远超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界限,就不可能解决这个革命的任何一个任务”。“中国苏维埃政权从一开始就不得不既没收外国资本的全部大资产,也没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全部巨额财产”,因此,应当明白承认:“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已经过去”,“不论按形式来说,还是按内容来说,或是按其动力和成分来说,它都具有新的社会主义的性质”。

既然过去的盟友已经成为不共戴天的敌人,罗明那兹的说法在逻辑上就不是毫无道理。多阶级的统一战线政权变成了工农民主专政,国民革命变成了彻底的土地革命,民主革命中的盟友变成

罗明那兹:《中国革命的新阶段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3
- 4期,1928年2月29日。

了仇敌,中国革命的动力只剩下了最激进的工人、最贫苦的农民和城市贫民,这一变化确实很像从俄国二月革命转变到了十月革命。既然革命的目标已经开始转向了资产阶级,中国革命当然也就具有了社会革命的性质。如果一面在政治上打倒资产阶级,一面在经济上还要按照民主革命的要求承认资产阶级有积极作用,岂不自相矛盾?况且事实已经证明,当革命起来之际,就连小资产阶级的利益都绝对不能顾惜,更遑论资产阶级?

但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上,土地革命毕竟不能和社会革命同日而语,工农民主专政毕竟也还不能视为无产阶级专政。习惯于把俄国革命的模式套用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并不等于说莫斯科的领导人相信中国与俄国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根据中国社会发展的水平和革命进展的程度,共产国际仍旧相信中国革命有一个不同阶段的问题,反对两步并作一步地将二者简单地混淆起来。在这个问题上,共产国际领导人一面很快批评了罗明那兹的所谓“无间断的革命”的说法,肯定“目前中国革命所处的时期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要想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而同时认为这个革命是‘不断革命’;这种倾向是错误的”,一面在中共六大上针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种种困惑,做了具体的解释。

1928年6-7月,中共各地的代表被召集到莫斯科去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们再三要求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于众多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的问题作出明白的说明。他们希望知道:苏维埃革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性质?如果说中国目前的苏维埃革命已经不是过去意义上的民主革命,难道不是因为它本身已经具有了某些社会主义的性质?如果说中国革命现在不存在社会主义的任务,那么为什么又要求我们必须支持革命中一切劳动群众的平均主义行

米夫:《中国革命的争论问题》,《布尔什维克》(俄文版)第3-4期,1928年2月29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1辑,第350页。

动,这难道不是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既然已经反革命,当然在经济上也要与苏维埃政权为敌,这时难道我们也不能没收他们的企业吗?中国革命既然不可避免地将走向社会主义,那么,它究竟需要在何时、何种条件下以及如何实现这种转变呢?是否共产国际认为,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注定了中国革命必将在相当一段时间稳定在民主革命阶段,并以此作为过渡呢?

要让处于革命重大转变关头的中国共产党人迅速从各种各样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的矛盾中解脱出来,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实上,即使共产国际领导人本身这时也同样被大量的问题所困扰,他们远离中国革命的实际,他们只能根据他们所能得到的或多或少的文字材料来揣测他们想要知道的东西。他们自己也未必能把许多复杂的问题搞清楚。但是,他们是共产国际,是上级,是权威,不论他们是否真的充满自信,他们也必须运用他们的思辨能力,依据俄国革命的经验,对一切作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并据此给出具体的政策。不过,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在大会上的解释仍旧有引人注目之处。

他一方面告诉中共代表:农民不是社会主义者,土地革命可以满足作为小私有者农民要求土地和财产的愿望,但这不是社会主义。因此,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仍旧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它与一般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同之处仅仅在于,这场革命是由工人阶级指导的并包含着反对资产阶级的内容,革命的动力主要是工人和农民,并且是以农民为最主要力量的,它的目的是要实现工人和农民的联合专政。但也正因为如此,这场革命就其实质而言,应当说是“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即使是工农专政的政权本身也“都带着很大的小资产阶级性”。在另一方面,他要求代表们了解,中国的经济状况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的差距。他明确认为:中

《中国同志向布哈林提出的十八个要求解释的问题》(1928年6月),《政治谈话会记录》(1928年6月14-15日)等。

国革命其实只相当于俄国的 1905 年。即使俄国 1905 年的工农民主革命取得了政权,“在当时的基础之上也并没有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之可能,不能开始建设社会主义”。虽然可以说中国现在面临的世界形势与当时俄国所面对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仍旧可以想象,中国“将来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要在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几十年之后”。因此,即使中国共产党人很快夺取了政权,推倒了资产阶级,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以内还是“不动摇他的经济基础的”。他甚至怀疑:“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或是说中国之非资本主义的发展之问题,乃是一种特别的方式”,因为中国的无产阶级恐怕不能依靠中国这种经济基础来独立地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点将必然的不同于现在的苏联和将来的欧洲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布哈林的上述说法并没有被纳入到俄国人帮助制定的中共六大的政治决议案当中。决议案除了继续肯定中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性质以外,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仅仅重申了它必然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而已,它甚至丝毫没有提到布哈林所着力强调的革命转变的经济因素。像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反复讨论的那样,它依旧把革命的主观力量的强弱视为革命转变的唯一重要条件,声称:“民权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程必须由斗争的力量来决定”,即“只有阶级斗争的力量对比能够决定”。这种说法严格说来只会加强相当一部分中国共产党人中根深蒂固的革命幻想。

几乎就在布哈林在莫斯科直截了当地告诫中共代表不要幻想可以较快过渡之后,中共中央在国内的机关报却在宣传:“工农民权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其中并无万里长城阻隔,非要经过多少年或等到生产力发达到了美国的时候,才可以到社会主义革命”,

《中国革命与中共的任务——国际代表在中国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莫斯科,1929年,第28-44页。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1928年7月),《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298-301页。

一切全都“要看我们在现时革命中的积极与获得的力量如何而定”。而六大决议中关于转变条件的说法,实际上还默认了这种观点的合理性。这当然为人们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李立三是第一个把中国必须迅速从二月革命转变到十月革命的观点理论化的共产党人。

1930年,围绕着迅速组织苏维埃全国政权的问题,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发生了一场重要的理论争论。当时,中国唯一有可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只有农村根据地,但堂堂无产阶级领导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怎么能建到偏僻的农村里去呢?中共中央反对任何这种尝试。他们坚信,苏维埃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居主导地位的中心城市,至少也必须暂时建立在重要城市里。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全力夺取一省乃至数省的政权,以便使苏维埃中央政府能够确实得到巩固的疆界并对全国形成很大的影响。但这个时候的共产党并没有这样的力量,即使通过少数中心城市的暴动和红军的进攻,暂时夺取了部分城市,在强大的国内国际敌人的联合压迫下,也难以坚持。因此,作为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李立三明确提出了以中国革命推动世界革命,通过世界革命来保障中国革命的重要观点。依据列宁的理论,他宣称:中国是整个帝国主义殖民统治链条中的一环,中国革命的爆发必然促成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总决战,因此,不仅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局部巩固起来的可能,而且没有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可能,“建立革命政权的开始,就是转变的开始。这里不但没有两个阶段,而且也没有间隔”。

针对中共中央如此顽强地表现自己的革命幻想,斯大林和共

克鲁:《目前几个重要理论问题的讨论》,《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23期,1928年7月10日。

参见立三《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4-5期,1930年5月15日;《柏山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30年4月7日)。

一切全都“要看我们在现时革命中的积极与获得的力量如何而定”。而六大决议中关于转变条件的说法,实际上还默认了这种观点的合理性。这当然为人们进一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留下了足够的空间。

李立三是第一个把中国必须迅速从二月革命转变到十月革命的观点理论化的共产党人。

1930年,围绕着迅速组织苏维埃全国政权的问题,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之间发生了一场重要的理论争论。当时,中国唯一有可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只有农村根据地,但堂堂无产阶级领导的苏维埃中央政府怎么能建到偏僻的农村里去呢?中共中央反对任何这种尝试。他们坚信,苏维埃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居主导地位的中心城市,至少也必须暂时建立在重要城市里。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就必须全力夺取一省乃至数省的政权,以便使苏维埃中央政府能够确实得到巩固的疆界并对全国形成很大的影响。但这个时候的共产党并没有这样的力量,即使通过少数中心城市的暴动和红军的进攻,暂时夺取了部分城市,在强大的国内国际敌人的联合压迫下,也难以坚持。因此,作为当时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之一的李立三明确提出了以中国革命推动世界革命,通过世界革命来保障中国革命的重要观点。依据列宁的理论,他宣称:中国是整个帝国主义殖民统治链条中的一环,中国革命的爆发必然促成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总决战,因此,不仅中国革命的胜利没有局部巩固起来的可能,而且没有停留在民主革命阶段的可能,“建立革命政权的开始,就是转变的开始。这里不但没有两个阶段,而且也没有间隔”。

针对中共中央如此顽强地表现自己的革命幻想,斯大林和共

克鲁:《目前几个重要理论问题的讨论》,《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23期,1928年7月10日。

参见立三《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布尔塞维克》第3卷第4-5期,1930年5月15日;《柏山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30年4月7日)。